

新兴哲学丛书

主编 庞元正 董德刚 韩庆祥

价值 哲学

阮 青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B018
R882

价值哲学

阮青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井 琪
封面设计 翟永莲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于小红 王京京
责任印制 张志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价值哲学/阮青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8

(新兴哲学丛书)

ISBN 7-5035-2995-4

I. 价… II. 阮… III. 价值(哲学)—研究
IV. 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854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三河丰华装订厂装订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 10.875

字数: 282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新兴哲学丛书编委会

顾问 韩树英 邢贵思 杨春贵
王伟光

主任 庞元正

副主任 董德刚 韩庆祥 张 峰

编委 (依姓氏笔画为序)

毛卫平 乔清举 李建华
侯 才 段培君 戴木才

新兴哲学丛书

总 序 言

组织编写新兴哲学丛书是我们的一种愿望，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许多专家学者辛苦劳作的结晶，更是我们为推动中国哲学的教育、发展和繁荣所做的一份努力。

新兴哲学丛书，是以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一系列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和新兴哲学分支学科为历史背景和研究主题，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新兴哲学分支学科、同时又对新兴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写作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一批科研骨干教师为创作主体，以加强哲学教育、促进学术交流和推动学术发展为目的，并注重科研和学术含量且能为读者所理解的一套丛书。丛书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我们所面临的生活世界，面向思想渐进繁荣的哲学学术界，面向人们所关注的时代话题。

改革开放 20 多年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特征，就是创新。这种创新归结起来，主要采取了五种方式：一是在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中进行创新，其最强烈的呼声就是“回到马克思”，这主要是“返本”；二是在对新的当代生活世界的理解中进行创新，其最强烈的呼声就是“回归人的生活世界”，使哲学反映时代精神，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这主要是“开新”；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交流中进行创新，其最强烈的呼声就是“走进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这主要是“对话”；四是在对哲学元问题进行重新理解中进行创新，其最强烈的呼声就是“重建新的哲学和哲学观”，这主要是“理解”；五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 价值哲学 ◇

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创新，其最强烈的呼声就是“与时俱进”，这主要是“中国化”。在其中几种方式中，出现了一种哲学分支学科日趋凸现的趋势和新的景象。许多专家学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日益突出的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人的问题、生存问题、交往问题、转型问题、经济建设问题、政治文明问题、生态问题、创新问题、公共性问题、对科学的人文理解问题和宗教问题，等等，或力求对这些生活世界新涌现出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寻求哲学创新的新生点，从而推进哲学的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是研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支重要队伍，在历来注重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对当代实践的重大发展，对重大的现实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推进当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而，它理应反映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这种趋势，把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人员组织、凝聚和整合起来，首先对在这种发展趋势和发展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学术成果进行清理与总结，做好学术积累工作；然后，在进一步提升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做好学术创新工作；再者，力图通过我们对新兴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为丰富和发展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为繁荣新兴哲学分支学科，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这就是我们编写新兴哲学丛书的动因。我们这样做，其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进一步营造和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加强学术交流，为推动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尽我们的绵薄之力；也在于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的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为了保证编写新兴哲学丛书的质量，我们确定了创作的原则、规范、要求和方法。首先是要选择新兴的比较定型的哲学分支学科，不大定型的哲学分支学科可以进行探讨，但不在选择之列；然后选择一些对我国哲学学术研究、学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比较了

解，并且具有一定学科背景、理论功底和研究基础的专家学者，来承担本丛书各部分的创作。创作的基本原则、要求和方法就是：把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比较成熟的、有代表性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清理与总结作为学术积累，这是“基础”；注重在学术积累基础上具有作者原创努力的学术创新，这是“推进”；把作品的科研含量与读者的热切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即注重丛书的学术含量，这是“深入”；让读者能容易轻松地感觉到本丛书的意义或价值，这是“浅出”；把遵循学术规范与尊重作者的创造有机结合起来，鼓励作者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劳动，这是对“努力和能力”的倡导；要求作者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在合理的学术规范和规则的前提下进行创新，这是对“规则”的坚守；把注重新兴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与注重提升学术思想结合起来，要求作者既考虑建构新兴哲学分支学科必须要解决好一些前提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这是解决“基本要件”，也要求作者特别注重提炼和提升出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是避免“让学科建构淹没自己的学术思想”。哲学说到底，既要事后出场，说明已经出现的时代精神，是“晚上起飞的猫头鹰”，更要事前引导，为时代的发展趋势提供前导性的理念，为茫茫的人生大海提供一盏灯，它又是“黎明前的雄鸡”。但哲学的功能，主要是生产理念、精神和思想的。

总的来讲，新兴哲学丛书具有以下特点：选题，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当代我国哲学发展的走向密切相关；作者主体，多是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专家学者；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或科研含量；读者范围，主要面向学术界、研究哲学的研究生和广大领导干部。

当然新兴哲学丛书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深知：某些作者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清理与总结不够，学术创新也不够；个别书的某些地方缺乏一定的研究深度；某些作者提出的个别学术观点和表述不一定全面和准确；每本书都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统一规范

◇ 价值哲学 ◇

不够。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改进的。

真诚地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他们具有全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出版理念和发展战略；他们热爱学术研究事业，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他们宁愿牺牲经济效益也要追求学术和社会效益；他们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顺利地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

新兴哲学丛书编委会

导论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 价值哲学研究

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序幕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序幕是同时开启的。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不能不思考价值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来反思价值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热起原因

价值哲学本身并不是一个新兴学科。早在 19 世纪末叶，价值哲学便在欧洲产生，20 世纪 30 年代东渐日本。中国作为日本的近邻，却没有像接受其他思想那样迅速接受价值哲学。30 年代至 40 年代，中国出版了一批以“价值论”为主题词的著作，但都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谈价值问题的。马俊峰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西方，价值论是作为近代的科学主义（确切地说应是科学至上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叛和对立而出现的，这无论是在早期的洛采、尼采、布伦坦诺和舍勒那里，还是后来英语语系的罗素、艾耶尔等人那里，都有明显的证据。而以本世纪初的中国，更缺乏更迫切需要的却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论思潮被忽略被遗漏就在所难免。”其二，“价值论向来与伦理学联系紧密，至今仍有人将之视为伦理学一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至上是一大特色，

◇ 价值哲学 ◇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指向之一正是批判旧道德旧文化，崇尚科学，受此风影响，自难对价值论予以重视。”其三，“一般的文化排异性和中国特有的华夷之别的大国意识，潜在却又十分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虽然当时有所谓‘中学与西学’之争，但西化论终为少数学者所持，大多数学人认同的是中体西用的观念，即使是留学西洋的人文学者，持此观念的也为数不少，故而几乎无人着意于价值论并予以介绍。”^①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中西方文化交流几乎中断，使国人对西方学术思想了解甚少；另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教条化、片面化的理解，对中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错误把握，我国曾一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对西方学说采取了排斥一切的极端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术界无缘接触西方的学术思想，更没有讨论西方学术思想的社会环境。因此，在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价值哲学或价值论曾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诸流派的热门话题，便被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拒斥，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禁区，没有人敢于涉及。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中国新时期的历史序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大讨论如同初春的一声炸雷，震撼了中国大地。长期受极左思潮和个人迷信束缚的人们开始思索，开始怀疑，开始探索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在解放思想潮流的冲击下，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人有没有价值、个人有没有价值、如何看待价值、如何评价价值等一系列价值哲学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涉及到价值哲学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社会实践提出了研究价值哲学这个重大理论课题

^① 马俊峰：《价值论兴起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

的需要，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正在于抓住社会实践所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并通过科学的研究给予切实的回答。因此，价值哲学问题一经提出，便很快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甚至成为官方提倡的学术理论问题。

价值哲学或价值论在 20 余年的时间内兴起、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应该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价值哲学理论研究的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中去寻找原因。

首先，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澄清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在改革开放以前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存在着一些误区，如我们借用马克思的话来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过于强调人的政治属性、道德属性，主张“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还有没有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单一性，却异化成“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我们公开倡导“破四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把传统文化的一切成果统统破坏掉。难道传统文化成果没有任何价值？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以政治标准作为惟一评价标准，凡是能够满足某种政治需要的就是好的作品，凡是不能够满足某种政治需要的就是坏作品，通通在被打倒之列。那么一个社会除了政治标准之外还能否存在学术标准、审美标准？评价一个作品除了政治标准之外还有没有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我们批判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但是却走向极端，变成拒绝一切外来的文化和知识。难道西方社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对我们就一点借鉴意义都没有？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涉及到

◇ 价值哲学 ◇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能否成功。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共同点在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价值哲学有某种牵连，甚至本身就是价值哲学的问题。因此，要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研究价值哲学的相关问题，价值哲学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其次，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深化，根源于价值哲学理论研究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着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也推动着价值哲学研究的深化。这种“呼唤”和“推动”是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价值观念、不断否定旧的价值观念，从而引导理论界、学术界通过研究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加强对一般价值问题的研究进而逐步构建起价值哲学体系来实现的。应该肯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作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而价值观念作为思想观念的核心部分会首先发生嬗变。2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价值观念也随之发展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哲学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化。当价值问题刚刚提出时，学术界首先关注的是中国需要不需要研究价值哲学、价值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如何理解价值概念、价值与事实的关系、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层次主体地位的确立，各层次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差别逐步凸现出来，导致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立体化。在这个时期，学术界开始立足于主客体的辩证法，着重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理解价值的本质和特性，并对一些重要的价值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形成几个互有区别和特色的研究方向，如从主体性角度、认识论角度、历史观角度等来研究价值问题。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各种具体价

值理论问题开始提出,且问题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种类越来越多样,与现实问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形成一些热点和难点。多数学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大胆吸取和借鉴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扎扎实实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所提出的价值理论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哲学理论体系。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价值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还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价值哲学进行研究和回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就意味着价值哲学的进步和深化。

第三,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许多学者指出,从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历史观、再到价值观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其间每一个阶段都曾经产生或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思潮或流派,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这样的。而这样一个总体发展趋势,恰恰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逐步深入和展开的过程。因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另一个目的甚至是更重要的目的是创造客体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必然会提出如何看待人的需要、如何理解价值的本质、如何确立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和原则、如何进行价值分类、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等一系列有关价值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价值哲学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

我们应当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现成的关于价值哲学的理论体系。但是也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价值哲学问题,并结合各自的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主题,提出过许多科学和精辟的论述,为我们今天建立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分析

◇ 价值哲学 ◇

和批判古今中外各种价值哲学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认为价值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的实践创造的,追求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和一般特征;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人民群众”观点,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哲学思想。他们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三个有利于”作为价值评价的标准和尺度,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作为实现价值创造的根本途径。这些思想既是 20 多年来中国价值哲学思想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又是今后我们继续进行价值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总之,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从兴起、发展到繁荣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探讨原因是为了通过揭示价值哲学研究兴起、发展和繁荣的必然性,来进一步探索今后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寻找进一步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突破口;但是,我们又大可不必在探讨原因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因为社会生活实践中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提出有关价值哲学研究的问题,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摆在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很好地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价值哲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必需。

第二节 研究进展

我国哲学界对价值哲学或价值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尽管“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当时依然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依然在原地蹒跚，中国思想界依然是乌云密布。面对经历了如此重大苦难的中华民族，人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很多，但众多问题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①“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表面上看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实际上更是一个价值论问题。因为，以什么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展示了中国人所推崇的是什么，所追求的是什么，这是一种价值追求，一种价值取向。所以，1978 年 5 月 10 日，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后，在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全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引起强烈震动，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篇文章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对几十年甚至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唯上”、“唯书”的价值观念的彻底反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要求人们运用新的价值思维对国人所持有的旧的价值观念进行全面批判，以中国社会实践为依据重新构建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正是由于对旧的价值观念的怀疑和批判，才带来了对整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怀疑。

1980 年杜汝楫在《学术月刊》第 10 期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文章在回顾和介绍了西方自休谟以来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讨论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后提出，认识有事实与价值之分。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是如何”的认识，而价值认识是解决“应如何”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更为重要的认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真实性的标准，也是合理性的标准。如果把价值认识与事实认识割裂开来，单纯强调其中一个方面，或者把二者不加区分的混为一谈，都会导致

① 据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记载，当时至少有三个地域、职业、年龄不同、且互不相识的同志撰写了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 价值哲学 ◇

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很显然，这篇文章已经认识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可能不对旧的价值观念产生冲击，不可能不提出价值观念转换的问题。随后，国内许多重要报刊如《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国内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刊物都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文章，价值哲学研究逐步兴起。

目前，国内学术界基本上都主张把 20 余年来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其中划分的细节不太一致。

第一个阶段，大约从 1980 年到 1986 年，是价值哲学研究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国哲学界对价值哲学的研究是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切入的，因此，价值问题的探讨一开始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的，主要讨论价值范畴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价值认识与事实认识的关系、价值与真理的关系等问题。如刘奔、李连科于 1982 年 9 月 18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李德顺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发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都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问题。1986 年李连科在《社会科学评论》第 2 期发表了《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不能单纯从认识论角度来研究价值问题，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中都有重要意义。这个观点的提出，对于拓展价值理论研究的视野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观的关系、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关系、价值意识和实践目的的关系、真理的价值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人的价值及其评价等问题，也是这个阶段讨论的热点问题。1985 年 5 月在安徽屯溪召开了“全国真理问题讨论会”，真理与价值的关系成为会议争论的最主要问题之一。1986 年 5 月，《哲学研究》编辑部在杭州召开“价值与认识座谈会”，使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这个时期代表性著作是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作者在该著作

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分析了价值与价值评价、价值评价与科学认识的关系，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人的价值等问题，说明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 1987 年到 1993 年，是价值哲学研究的展开阶段。经过第一个阶段的讨论和研究，“1986 年下半年以后，大家感到价值论研究难以深入，”“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大体上局限于价值与认识、价值真理等问题上，无论从选题范围上、思路上都缺乏新开拓。不少文章内容重复，使人感到价值论研究的贫乏，缺乏生气。”^① 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价值论研究的问题所在，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价值论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对价值概念本身的理解就是其一。当时国内学术界不少学者对价值概念的理解源自于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句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从而主张马克思认为价值就是客体在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中产生的，因此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针对这种观点，1987 年 1 月 5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郝晓光《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认》一文，认为上面所引用的那句话是马克思转述瓦格纳的观点，是对瓦格纳把使用价值当作价值观点的批判，因此不能把这句话作为哲学价值的定义。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由此人们开始对价值本质、价值属性等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光明日报》等一些重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作为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性成果，1987 年 9 月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

① 王玉樑主编：《价值与价值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06 页。